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状、问题与展望材料综述

袁 卫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

一、发展现状

自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度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规模快速扩张阶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举跨越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1、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从1998年的108.36万人增至2006年的546.05万人，增幅达404%；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从1998年的340.83万人增至2006年的1738.84万人，增幅达410%。研究生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25万人增至2006年的39.79万人，增幅达449%；在学研究生规模从1998年的19.89万人增至2006年的110.47万人，增幅达455%。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25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

在高校学生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高校数量及规模也在不断增长。1998年，中国共有普通高校1022所，其中本科院校590所，高职高专院校432所。到2006年，高校数量增至1867所，其中本科院校720所，高职高专院校1147所。1998年，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平均规模为3335人，到2006年，其平均规模已达8148人。

2、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深刻改变。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无论是层次结构，科类结构，还是布局结构，在大众化过程中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层次结构看，专科比例逐渐提高，本专比例趋于合理。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比例由扩招前的2：1变为2005年的1.02：1；扩招以来，专科增长幅度一直高于本科，自2002年起，专科招生数量开始超过本科。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重点正逐步从本科层次转移到了专科层次，专科教育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这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

科类结构方面，基础学科的规模及比例呈下降趋势，而一些实用性以及与经济社会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的规模及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同时，人文社会学科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并且与理工科的比例关系趋于平衡。1998年，理科和文科的比例是1.64：1，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为0.99：1，文理科规模基本持平。同时，大众化以来，基础学科开始逐步加强本科教育的主导地位，而应用学科中专科层次教育的地位也逐渐得以加强。1998年基础学科的本、专科比为1.3：1，2004年变为1.66：1，本科比例上升，专科下降；而在应用学科中，情况则相反，1998年应用学科的本专科比为2.2：1，2004年变为1.12：1。这种变化既符合了学科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也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从布局结构来看，一方面高校设置向西部和地级城市倾斜与延伸，打破了高校主要集中于东部和大中城市的格局，地区之间差距正在缩小。同时，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结构无论是科类还是层次，都呈现出高度的趋同化现象，缺乏一定的区域特色，与区域发展的相关性较低，反映出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和现象。

3、高等教育的形式向多样化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了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目前，中国高校有各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大学、学院、高职高专、全日制普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学院、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各种非学历证书教育等。民办高等教育和独立学院从无到有，发展很快，目前在在校生人数已占全国总数的16%。此外，中国还有世界上独有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对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4、高教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从宏观上看，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改革，促进了一批学科综合和人才汇聚的综合性大学，形成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的建设，加上一批地方重点大学的建设，在大众化进程中始终没有放弃精英教育，做到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协调发展。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及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但使高校创新能力和为经济社会直接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而且大大提升了这些大学的整体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从微观上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已被打破。在高校内部，院系决策权力正在进一步增加，高校内部治理面临重大改革。

二、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扩招，终于改变了自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多年来徘徊的精英教育性质，跨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对增进入学机会、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对于中国人口素质的改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的跨越式发展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

1、质量问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无疑首先应对其质量变化进行研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大多数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由于高等教育经费、师资队伍及软硬件建设跟不上其规模扩张速度，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对于此问题，一方面要控制增长速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教学改革，切实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不能用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观看待和评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

2、结构问题。如前所述，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大众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问题也相当突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现有学科结构基本上是对精英教育阶段科类结构的复制，即学科存量越大，其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越高，增量也越大，该学科在扩招过程中的增幅也越大；反之亦然。这反映了一种“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所以，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学科结构与1998年比较，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是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比例结构。二是不同地区的高校之间学科结构存在严重的趋同性。

3、高教经费投入问题。2004年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1009.8亿元，占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22.6％，占当年GDP的0.63％，总额虽然比1998年的383.8亿元增加了2.63倍，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由于在校生规模增加得更快，生均经费大幅度下降。2005年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加了3.58倍，由此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2892.65元下降到2005年的2237.57元，减少655.08元，降幅22.65％。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9829元下降到2004年的6982元，减少2847元，降幅29％。由此，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重由1998年的64.9％下降到2004年的45.5％。即使学校加上收取学费和其他创收经费，生均经费仍然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形势下，如何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如何科学制定学费的标准，如何办好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如何保障家庭贫困学生上得起高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大问题。

4、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毕业生就业率低更是其中突出的问题。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持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就业率在90%以上表示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在50－7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压力；就业率在30－5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困难；就业率在30%以下表示可能产生就业危机。2001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6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仅为50%。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公布的是9月份和12月份的就业率，从2004年起，就业率均在70%以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中国东、中、西部16个省份34所高校2005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2005年6月下旬，已经签约的是33.7%，已确定单位并准备签约的为13.5%，准备自主创业的为3.6%，保送研究生为4.8%，考取研究生的为12.0%，准备出国的为2.3%，申请不就业的为4.8%，七项合计毕业生毕业时的“落实率”为74.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学历之间差异显著，专科和高职为59.1%，本科为77.6%，硕士和博士分别为84.1%和79.3%；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78.8%、75.1%和65.0%；各类型学校之间差异明显，“211工程”大学的落实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落实率为70.8%，专科院校的落实率为58.9%；性别之间差异存在，男性的落实率为77.1%，女性为71.2%。在此次调查中，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做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1001－2000元的占65.4%，2001－3000元的占9.2%，3000元以上的占5.1%。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已直接影响到高校改革与发展，影响到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当前急需对人才需求做出较为科学的预测，需要切实转变学生和家庭的就业观念，政府需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凸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5.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高层次人才、顶尖人才缺乏。纵观国内各高校，整体上尚缺乏一批学贯中西的拔尖人才；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性程度不高，许多重要学科没有形成由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顶尖学者为领军人物的学术队伍。

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整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很快，高校在持续扩招的同时却对教师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多数高校缺编严重，生师比过高，教师队伍规模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普通高校在校生增加了4.1倍，而专任教师数量仅增加了1.64倍。高校师生比为1：17.93，许多学校、许多学科师生比已经达到1：30。

　　学术精神倒退、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前，高校教师的学术精神有所下降和倒退。部分教师过多关注各种评审、奖励、荣誉和称号，表现出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学术腐败等问题屡有出现，有的违背基本学术道德，或抄袭剽窃，或请人代写，或署名不实；有的片面追求数量，脱离实际，粗制滥造，甚至篡改、伪造数据；有的热衷于校外兼职，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一切为了学生的观念严重淡漠。

6、高校学费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免费提供，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主要成本和几乎所有的直接成本。这种完全由政府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这样的机制存在两大根本缺陷：一是对于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人群而言，免费的高等教育是最大的不公。因为在大众化之前，仅少数人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私人收益率很高的高等教育而言，如果私人不分担成本，则显失公平。二是导致高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

1998年以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政府分担成本的比例逐渐降低，私人分担成本的比例不断增加。高校扩招前的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78.3％，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45．5％。与此相反的是，学杂费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4．8％增加至2004年的30．41％。目前，由国家、个人和社会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变革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表现为私人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比例过高，高校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标准为1589元，2004年则升至4785元，是1997年的约3．1倍。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约1．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1．8倍。由于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年来日益扩大，导致对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而言，学杂费标准和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西部某省为例：1997、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99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为0．82；而到了2004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22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约为0．36。比1997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算上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学习费用，对该省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7、高校贫困学生资助问题。

高校扩招以来，中国高校贫困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高校在校生中的贫困生比例约为20％，其中特困生比例为8%。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四省区20所高校的调查，农、林、师范类学校贫困生比例超过30％，特困生比例超过15％。高校贫困学生规模的扩大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是私人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迅速增加，高等教育支出成为很多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二是中国的贫富分化在过去的十年里呈扩大之势。

高校贫困学生资助是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本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中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以来，政府部门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数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奖、贷、助、减、免”的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目前，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补偿机制逐渐形成，高校扩招以来日益突出的贫困学生资助问题开始得到缓解。

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还处于改革与探索阶段，相关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资助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资助的方式看，目前中国高校学生资助的手段还比较单一，基本以学生助学贷款为主，其他的资助方式如奖学金、勤工俭学等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从资助的主体看，基本以政府资助为主，非政府力量如公民和企业捐赠等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从资助的力度看来，目前高校学生助学贷款的受益学生数约占全国各级各类高校在校生数的10．5％，仅能覆盖一半左右的贫困生。而且，不同类型高校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列入“985工程”和“211工程”学校的学生更容易申请到贷款，高职高专和民办高校学生申请贷款的难度还比较大。总体看来，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以及学生助学贷款的风险规避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所形成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比较脆弱，需要进一步变革和完善。

8、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使高等教育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分享，而不是仅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入学机会，使得高等教育惠．及普通人群，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众化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仅仅反映在总体层面，事实上，在短期内大众化并没有缓解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质量上的差异。就区域差异而言，在此我们选择三个指标予以说明：一是各地区普通高中升学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入学的难易程度。2005年，全国范围内高中升学率为76．25％，但最低的宁夏仅为53．64％，最高的北京高达216．84％，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四倍；二是各地区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这一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各地高等教育的质量差异。就绝对差异而言，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14929元，最高的北京为30634元，最低的贵州为8103元，二者相差高达约3．8倍。就相对差异而言，据测算，高校扩招前的1997年，各省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的变异系数约为0．29，而到了2004年这一指标已经变为约0．38。三是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2005年，全国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为1613人，但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极为显著，最高的北京高达6580人，最低的贵州仅为838人，差距高达7.85倍左右。在阶层分化上，我们可以参照高等教育辈出率这一指标。截止到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还是一些抽样调查，但诸多研究均发现社会中不同阶层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例如，厦门大学教授谢作栩等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分别为5．9和3．9，远远高于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和城乡无业人员的辈出率，后者的辈出率依次为0．76，0．59，0．51和0．46。刘精明通过对1978－2003年间的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展对教育平等的影响十分复杂。如果将各类高等教育机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会发现1998年以后高教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然而深入的分析表明，这样的平等化过程是有条件的，内涵于高教领域的社会阶层差异仍然十分明显。高等教育本身的质性差异决定了各社会阶层对这种机会的竞争取向和策略；在地位取向明确的本科教育中，高校扩招导致优势阶层较大程度地扩大了他们的相对优势；而生存取向明确的成人高教领域的机会扩大，则使下层社会群体获得了更多的益处。

9、大学评价问题。

从国际上看，大学排行(排名)通常是用一套共同适用的指标体系将一定范围内的大学（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按照得分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因此，大学排行榜实质上是把许多大学的全部工作归结为单一的、可比的、量化的指标体系。排行榜不同于大学评估与绩效评估，大学评估与评价通常是由政府或其他机构发布，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该高校与某些基准指标相比办学状况如何。而在特定指标体系基础上编排出的大学排行榜，则是作为一种比较的手段，使各个大学一比高低。并且，世界绝大多数的大学排行榜是由商业出版机构运作的。把不同学术领域内的工作转化为单一的、可量化的分数来比较各大学，这是人们批判大学排行榜的关键所在。

从国际上看，大学排行榜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经过高等教育大发展，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任务，高等教育系统完善之后出现的。中国目前高等教育仍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代，高等教育虽然在数量上已实现大众化，但在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巩固、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制度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因此，中国目前进行大学排行的条件并不成熟。客观条件不具备环境下推出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有可能误导大学、社会公众及政府，诱导大学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追求急功近利而漠视学术道德。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的浮躁之气与大学排行榜有一定的关系。

在大学排行日益火爆的今天，我们只能以理性精神引导大学排行向比较科学的方向发展。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实和大学排行榜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排行的理念，只有以科学的理念作指导，才可能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引导大学排行健康发展。

三、未来展望

1、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控制增长速度。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不可能再以过去10年那样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将依据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适龄人口变动情况，保持高等教育以较低速度增长。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考虑人口变动情况。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阶段适龄人口为10995万人，到2008年达到峰顶，为12487万人，从2009年开始则持续下降，到2015年为9257万人，2020年8717万人。即使保持现有招生规模不变，在2008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高峰之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会随着适龄人口的下降而不断上升。

2、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层次结构方面，致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职业操作型人才；在科类结构方面，高校应主动结合经济社会需求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调整科类和专业结构，使高校的类型、科类和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协调；在布局结构方面，要逐步形成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布局结构。

3、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移的发展战略。当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的主要任务和战略重点。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深化 本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此，需要从宏观上解决教学投入不足、师资队伍建设不强、管理不到位、教材与教学方法等问题，要从全局高度思考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化教育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以切实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4、完善投入机制和学生资助体系，高度关注毕业生就业问题，努力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中国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建立科学合理的学费体系和学生资助体系，保证每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益。同时，需要切实关注高等教育公平。大众化只是从数量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公平，而如何从“质”的方面去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还需做出艰苦的努力。

5、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宏观的变革，同时也对高校内部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中国高校不同程度存在着权力集中、监督机制弱化、学术权力缺失、行政权力失范及内部权利配置失衡等问题，急需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同时，为了完善大学与政府及社会的关系，需要发展教育中介组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但相应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政府职能转变与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落实之后，谁来承担那些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的，或者新体制提出来的新的不宜由政府承担的管理责任？当然，理应属于高校自主决定的有关权力和责任应该由大学自己负责，如《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有些职责却是单个高校自身所难以承担的，例如高等教育质量监控、高校评估与排名、高校的行业自律以及高校如何去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等。在政府权力下放之后，便会出现某些“权力真空”地带，如其他行业或事业一样，能够承担“权力真空”的便只能是协调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教育中介组织。如大学联合会这样的教育中介组织能得到充分发展，不仅能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而且将提高政府管理的成效。因此，建立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反映与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6、建立较为科学的大学评价体系。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以后，社会对高校的认识与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校不但为社会培养“精英”，而且要为各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从业者；不但要满足社会对高水平学术的要求，还要满足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因此，建立起科学的大学评价体系，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个体，都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中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需要以科学的评价体系为支撑。

http://www.china-europa-forum.net/bdfdoc-996\_zh.html

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定位审视

李建强 陈鹏 黄海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定位审视，还存在一些欠缺和偏差。本文试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高教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改革方向和对策作一概述。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界展开了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并取得了不少共识。1998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则明确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今后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此前此后，各高校纷纷响应，根据各校具体情况，积极进行改革实践。此轮改革针对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过分强调培养专业人才的弊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文化素质教育为突破口，以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为重点，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在教育模式上，注重学校和学生的自主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教育工作者就意识到国家对高校管得过死，不利于高校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提出要深化高校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还分别在招生权、教学权、学科专业设置权、科研权、人事权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为高校自主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扩大高校自主权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要按《高等教育法》规定，切实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正因为有了观念的共识和法律的依据，之后经过多年的探索改革，我国高校在招生、教学科研、经费筹措、人事等方面逐渐有了较大的自主权。指令性的要求日趋减少，指导性的意见愈益增多。2002年3月，教育部又作出决定，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六所高校可自主设置本科专业，使高校自主权改革向纵深发展。

　　为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各高校都从学分制入手，不断深化改革。北京大学提出本科学习制度从学年学分制转变为“自由选课学分制”，学生在教育计划和导师的指导下，自由选择教师和课程。复旦大学推出“完全学分制”建设方案，建立合理的课程结构，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实行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一些院校还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实行更为宽松的专业选择制度。此外，一些高校还在跨校选课、学分互换等方面进行改革尝试。目前，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天津等地的部分高校之间积极开展合作，实行互选课程、学分互认以及转学等新举措。通过改革，大学生们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和自我设计、自由发展的空间。

　　（二）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综合性和适应性

　　建国之后，我国借鉴苏联模式，按照“专才”教育目标，一方面削减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按照产业部门、行业甚至产品类别设立口径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这种“专才”教育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很难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此轮改革通过高校合并、学科与专业调整、课程综合化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宽口径的学科和课程大平台。

　　在国家教育部的推动下，高校之间按照合并、合作的方式，建立起一批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到2002年，先后有708所高校合并组建为302所综合性的高校；有317所高校开展了校际间的合作办学，形成了227个合作办学实体。同时，教育部还进行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不断拓宽专业口径，调整专业目录，目前，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已由1998年的504种削减到249种。我国高校文、理、工、农、医分校，学科单一，专业狭窄的状况已有所改善。

　　高校内部也积极推进改革，通过调整不合理的课程体系，实行课程设置综合化，以拓宽专业口径，实现从“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转变。为打破专业和学科壁垒，培养复合型人才，北京大学计划从2003年开始，招生时不再分专业，实行按院系、学科大类招生，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高年级实施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清华大学提出在“十五”期间，将实现本科教育从传统的“专业对口”向加强社会适应性和人才培养多样性方向转变，培养过程从单一学科背景向加强学科的交叉与综合方向转变。与此同时，一些高校还设立综合化改革试点，探索综合性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三）在素质教育上，重视学生发展的全面性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生素质培养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重视“成才”教育、轻视“成人”教育；重视知识教育，轻视素质教育；重视科学教育，轻视人文教育。为改变这一状况，各高校都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举措。

　　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方面，不断深化“两课”教育改革，探索有效进行“两课”教育的新模式。如清华大学指导学生阅读经典，通过专题向研究性课程过渡，组织学生与教师一起开展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上海交通大学在做好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思想政治工作“进学生社团、进生活园区、进校园网络”的思路，并持续举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生骨干培训班，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增强了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方面，针对文化教育薄弱的情况，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全国52所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 1998年，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颁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随后正式建立32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试点的带动和《意见》的指导下，各高校纷纷通过设立人文选修课、开设人文讲座、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建立校外文化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2002年 3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又联合下发通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3所高校试行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标志着全面素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在能力培养上，突出创新性与实践性

　　我国传统教育注重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尤其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针对这一问题，本次高等教育改革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全面发展教育改革的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

　　为贯彻这一精神，各高校首先从减负做起，通过减少学生的学分、学时和课业负担，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进行探索研究和参与实践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北京大学把本科生的总学分从80年代的200多学分逐步减少到150学分以下，南京大学则通过实行“三学期制”来减轻学生的课内学习负担。其次，高校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鼓励学生积极从事科研创新和实践活动。清华大学在本科生中推广 “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鼓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探索性研究工作。上海交通大学推行本科生提前参与导师的科学研究，完善各类实践环节，开展“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活动，此外还积极鼓励学生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并争金夺银。一些高校还通过设立第二课堂，组织社会实践、科技比赛、学生社团以及志愿者活动等多种途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定位的高等教育改革，冲击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已在高等学校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也看到，现有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高等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素质教育的形式化、表面化倾向，是对 “人的全面发展”的改革目标定位的误读。

　　高校提出素质教育，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过弱的人文熏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的倾向提出来的，其主旨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推进素质教育，各高校在改革中都出台并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如前所述，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对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问题在于，许多学校的改革存在着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即把改革的这些措施和活动作为一个项目、一种程序来做，或者仅仅当作一种手段和工具，而没有当作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根本原则，在实践中只不过把素质教育作为知识教育、专业教育、课内教育之外的一个添加成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许多高校出台的素质教育计划，几乎都是建设几个素质教育基地，举办一些素质教育报告，开展一些素质教育活动这样的程式。这种把素质教育仅仅作为附加和点缀的做法，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高教改革目标的误读。

　　（二）培养方式上过多的共性制约，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尊崇个性发展的内涵。

　　传统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崇尚工业经济时代的“批量生产原则”。与此相对应，学校培养人才的模式，也是按照统一规格，大批量生产“标准件”人才。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创造和增值不再是通过批量的规模来实现，而常常是通过创新，通过有特色的产品来实现的，反映在对人才的需求上，要求必须具备自发性、创造性、前瞻性和快速适应性的品质。因此，尊重个性，以学生的个性为本，是未来社会对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内在的本质规定。

　　前述的高教改革，在尊重学生个性方面作出了努力，但由于相关配套的缺失，虽然在形式上给了学生选择的自由和参与的权利，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点到适合自己兴趣和特长的“菜肴”。原因在于，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考虑的更多的是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规格，并据此设置专业，设计学时、学制，制定大纲，提出要求，因此对同一专业中（在一些学校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专业权）不同特点、不同层次的学生仍然是以同样长的学时、完全齐一的内容、同样规格的目标来要求的；教师备课、上课考虑更多的是教学本身的系统性、逻辑性，很少注意对学生的针对性、可接受性。诚然，教育的最终目的包含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依赖于有创造性的个体。而且从逻辑上说，教育也不能直接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要实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促进个体的发展来实现。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满足不同个性学生成才的需要。过多的共性制约显然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三）忽视发展的可持续性，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的贯彻缺乏持久的动力。

　　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过去人们强调比较多的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作为接受教育的个体，也有一个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前者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后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据。两者的融合是贯彻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持久动力。

　　当前的高等教育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教育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超越性和持续性，即既要立足于现实，又不能拘泥于现实，而应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但是目前我国的高教改革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模式，到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设计，守成多于创新，不是根据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可能的发展变化主动进行调整，而是被动适应社会的嬗变。其次，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较多，培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方法较少；专业教育较多，基础教育较少；传授如何做事方面较多，教育如何做人方面较少。这样的教育必然使学生走向社会以后的适应性较差，发展后劲较小，很难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对此，有识之士们早有洞察，但大都思多于履，言多于行。如何实现思与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已经现实地提上日程。

　　（四）教育评价中的机械化、教条化倾向，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

　　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质量标准的刚性，即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学校采取同样的标准；对不同能力趋向、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同一规格的静态评价标准。其二是质量标准的单一性。例如对教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争取到多少科研项目，取得多少科研成果，完成多少课时，并以此作为教师晋升晋级的最终依据；对学生评价的指标囿于接受知识的多少，而反映知识多少的标准主要是考试分数。其三是质量标准的绝对性。所有的人才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都要达到某一固定的或绝对的知识水准，而不考虑每一个人在知识结构、文化价值观、理解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原有的基础。这样的质量观的导向就是培养统一规格、达到统一要求的 “合格”人才；而对受教育者来说，似乎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开发自己的潜能，而是为了被现存的教育体制鉴定为“合格”。

　　近年来，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传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例如对学校的评价，还是从学生规模、师资队伍数量、论文数量等诸方面打分排名；对学生进行综合测评，还是将学生应具备的素质细化若干，每一方面量化打分。这种评价的机械化、教条化倾向，必然导向学校失去办学特色，学生失去鲜明个性。而失去特色和个性，科学意义上的质量又从何而来？常见情况是：教师为了达到指标的数量和档次而疲于奔命，忽视对学生的辅导和培养；学生为了分数费劲心机，不惜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总之，这种裁剪特色、削减个性的质量观和评价制度，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的导向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

三、推进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凸显出来的问题，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审视，今后的改革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树立新的教育质量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以求对未来高等教育改革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如前所述，以传统质量观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象历时性和发展性的变化，其负面的导向显而易见。要保证高教改革不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必须以新的质量观为基础，构建一个多元、柔性、相对的、符合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实际、具有正确导向的评价制度。

　　对高校的评价，要充分认识不同学校拥有的不同的办学历史、发展目标、任务和职能，从而确立多元化的评判标准，鼓励大学办出特色。

　　对教师的评价，虽不能完全抛弃奖惩性的评价，但要弱化奖惩性、甄别性的评价功能，增强发展性评价的功能。实践证明，基于结果的奖惩性评价对激励教师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作用非常有限，必须通过满足他们社会、心理方面的需要，即通过发展性评价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从而达到学校总体发展与教师个体发展需要的统一和默契。

　　要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学生，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灵活的评价制度，以保护和发展学生的差异和个性。例如，对不同基础、不同特点的学生的评价，要注重他们在原有基础上的进步和提高。对于学生的不同能力，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从教育评价的角度对学生某些能力上的特殊发展予以承认，这样才能使各类学生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和潜能，成长为既全面发展，又具有特色、特长的创造性人才。

　　（二）深化高等教育宏观体制改革，扩大和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人的全面发展创设最佳的教育环境。

　　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教育环境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教育自身的自我选择的确立，以及对受教育者主体需要的充分满足。这些都依赖于高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因为只有拥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学校才能够自主地进行变革、自主地选择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自主地实践非凡的办学思想和超常规的发展措施，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设自主选择的教育环境。否则，雷池难越，动辄得咎，学校就只能搞形而上的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在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已提出十多年，并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是，如果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来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仍是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重要体制因素。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何依法落实高校的自主权，即一方面是政府如何进一步放权给高校，另一方面是高校如何用好办学的自主权。从政府角度说，首先要转变观念，摆正与高校的关系，并切实转变职能，摆脱事务性的过程管理，加强宏观规划，具体说就是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由具体管理变为整体管理，由硬性管理变为软性管理；从高校角度说，要确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观念，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行运作，实行学生为本、通才教育和学习自由。与此同时，高校还必须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增强自主办学的能力。为此，应尽快建立一支高水平、职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使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需要，具备自主办学的能力。

　　（三）实现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转型性变革，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目标和功能的转变，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得以顺利实施。

　　高校在扩大自主权等方面的改革是宏观体制层面的改革，它解决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矛盾、外部约束，高等学校内在层面的改革也不能忽略。这是由高等教育本身的功能和使命决定的，因为学生的培养最终仍然是学校的任务，高等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必然落到高校身上。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必须有利于高校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取向上的前瞻性，即高校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去思考今日之改革，找准学校的定位，制定好学校远、中、近三程的发展规划。二是在改革内容方面的适应性，即学校内部的各项改革如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要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功能定位，真正以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着力进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整合，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以保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教改革目标得以落到实处。

　　（四）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主动纳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高教改革的终极目标。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明确提出了教育的发展目标：“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明确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偏离这一目标。这是因为，首先，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的提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其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教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教育的发展程度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也是基本内容之一。

　　高等教育的改革要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切实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等一系列创新思路和举措，改革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的素质。这事实上是高等教育工具意识向本体意识的回归，是高等教育本质的体现。

　　需要指出，贯彻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和高校领导的事，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求教师、教育管理工作者都应具有全面发展的理念和全面发展的素质，并以此为目标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当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观念、认识、行为真正提高和到位之日，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改革目标切实落到实处之时。

--------------------------------------------------------------------------------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的全面发展与高教改革的目标定位和政策措施》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http://gfb.sjtu.edu.cn/yjcg\_read.jsp?id=35

（本文发表于《上海交大学报》2003年第2期）

在服务社会中实现我国高校的超常规发展

马德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而且其发展程度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高校如何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融入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建设中，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即是有效途径之一。

　　一、从世界范围看，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取得成功的重要路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曾经说：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是现代美国多元化大学存在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与其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一样，都是无与伦比的。①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美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先进教育中霸主地位的确立，是与大学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和贡献分不开的。

　　美国大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机遇期：第一次是赠地运动。19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以赠地形式支持发展大学。在赠地运动的推动下，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康乃尔大学等一大批高校相继诞生。赠地运动的开展赋予大学全新理念：高校在接受社会支持的同时，必须为社会服务，与社会紧密联系，达到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共荣。这一理念把传统大学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推动了美国大学的蓬勃发展。并向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大学办学模式的创立。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爵士曾对此予以评价：“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②

　　第二次机遇是二战期间联邦政府与大学的科技合作。战前，美国政府的科研项目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的小型实验室和实验站，大学很少申请到联邦政府的研究基金。战时的紧急需求拉近了政府与大学的距离，大学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自1940年开始的“工程、科学与管理”战争培训计划。因为战争需要，联邦政府通过国防研究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统筹全国的科学研究力量，集中财力进行雷达、原子弹、火箭等重大项目的研制。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一批研究型大学主动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国家的这种紧迫需求服务。据统计，在此次被称为“曼哈顿工程”的重大科技攻关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等8所研究型大学争取到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总经费的90%，学校的科研潜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③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就完成了雷达、原子弹等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工作，为盟军赢得战争、结束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期间大学在军事科技研究上的成功，壮大了美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队伍，推动了大学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使了美国科技政策的转变。政府在科研上越来越依赖于大学，大学逐渐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核心部门。

　　第三次机遇是战后产业界与大学的密切合作。战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技术不断涌现，人类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企业界带来了无限商机，也为产业界与大学的合作创造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率先划出7.5%的校园土地（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生产的企业。由此，一批在科学技术上各有侧重的高新企业围绕大学群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中心的“硅谷”和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公路”等科技园和科技带。这些区域吸引了众多新兴企业，一批批大学毕业生进入园区创业，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又使大学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在园区得到转化。1963年，赴美参加活动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诺就此感叹道：“现在，美国正以我们所有人都为之惊奇的速度不断取得科学成就。想一想，人才的惊人集中，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分布在从伯克利和斯坦福到帕萨迪纳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海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才象这里一样集中。有时，欧洲人惊讶地意识到，在美国竟有那么多人在进行西方纯科学的研究。足以引起人们好奇的是，美国人自己也常常对此感到惊奇。粗略估计，这个比例可能达到80%左右，也许更高。”④产业界与大学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以硅谷为例，聚集了近数十万名工程师，数千家高科技公司，平均每周有一家高新科技公司上市；全球10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雅虎等20多家在此落户；硅谷吸引了美国1/3的风险投资，其年创工业总产值达2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同时，硅谷地区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学的快速发展，造就了斯坦福、伯克利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人们都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我还要加一句话，没有硅谷就没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学。”

　　可以说，美国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是在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中实现的。正是在服务社会的全新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大学才能后来居上，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远远甩在后面。

　　英国是大学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早在12、13世纪就已经出现，然而英国大学却由于固守传统、因循守旧而发展得相当缓慢。到19世纪中期，牛津和剑桥大学还只是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仍然首先是国教会培养牧师的机构，主要实施以培养绅士为目的的教养教育。那些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直接相关的科学知识和专门知识则被拒之门外。而同期，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则开始了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通过发展科学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服务，德国大学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并逐步成为世界当时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之下，传统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不仅封闭了英国大学自身的发展空间，还牵制了英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当时，大学培养的人才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英国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更是明显落后于德国，这使得英国政府意识到科技教育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19世纪末期开始进行大学的改革和扩张，建立起一批市民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则随之增设科学和专门知识课程，建设实验设施，成立专门的研究所，开始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人才和科技服务。

　　二战以后，美国大学的快速发展更英国产生了极大冲击。英国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大学改革，发起新大学运动。根据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需求，建立20多所全新的国立大学，并期望这些大学能够在推动大学制度改革，克服传统大学制度的弊端上起到促进作用。80年代，英国政府又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即为了兼顾国家和高等学校自身的利益，大学必须更有效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必须在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与工商业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政府的引导下，英国大学逐步转变办学理念，把服务社会作为学校的职能，通过专利转让、创办科学园、合作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为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自身的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得以明显提升，并因此获得大量的办学经费。2003年，剑桥大学的总收入为4.65亿英镑，其中与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工商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科技合作获得的科研经费和补助收入高达2.30亿英镑，占总收入的49.5%；⑤牛津大学通过科技合作获得的科研经费和补助收入为1.63亿英镑（不包括HEFCE科研补助），占学校总收入的36%。⑥此外，剑桥和牛津大学还通过成立专门的联络办公室，创办大学科技园区等形式，加强与工商企业、地方政府和社区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在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中，重新找回了昔日的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兴的英国大学通过服务社会，与社区、产业界提携互动，在很短的时间内跻身英国大学乃至世界大学前列。以沃尔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新建的沃尔克大学顶住压力（校内一批教师的强烈反对并引发学生的骚乱），坚持走有别于传统大学的发展道路，倡导进取精神和开阔的眼界，与工商界建设紧密的合作关系。1967年，沃尔克大学成立商学院，1980年筹建沃尔克制造集团（Warwick Manufacturing Group），1984年又建立沃尔克大学科学园（Warwick Science Park），用自身的知识优势为地方工商业的发展服务。学校也因此得到了工商界的反哺和支持，壮大了办学实力1982-1983年度，沃尔克大学从政府获得的收入占学校总收入的69%，而2002-2003年度，在学校2.13亿英镑的总收入中，从HEFCE获得的收入仅为0.51亿，占总收入的24%。⑦正是凭借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沃尔克大学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跃居英国大学前列。在2003年英国《泰晤时报》“优秀大学指南”综合排名中，沃尔克名列第七位。沃尔克大学还被誉为寻求产业与学术有效结合的先驱。英国首相布莱尔曾高度评价道：“沃尔克因其活力、质量和创造的热情而成为英国大学的灯塔。”⑧

　　今天，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把服务社会作为核心理念，自觉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斯坦福大学提出“立志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知识”；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学校要致立于发展知识，培养学生在科学、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学识，最好地为国家、为世界服务”；剑桥大学的使命是：“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平的、优秀的教育、知识和研究，为社会作出贡献”；牛津大学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使世界、国家和地方社会富饶起来”；东京大学则期望“通过积极地用研究成果回报社会和工商业，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一大学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既是顺势而生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二、我国高校在服务社会问题上的螺旋式发展

　　1、步履曲折，留下诸多反思

　　与美国大学始终牵引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历程不同，我国大学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高校基本上不承担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远离科技研究。如果说，当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阶段，各种弊端尚不明显；那么，当改革开放、科学技术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之后，高校的科研与国家战略和需求存在的距离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初期我国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高等教育也全面学习苏联。1952年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我国高等教育从此纳入了“苏式”的高度计划和专才教育模式。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高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适应当时国家工业化的需要，重点发展了工科院校和师范院校。据统计，院系调整后的1953年，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工科学生由1949年的3万人，占在校生的26.2％，上升为1953年的8万人，占在校生的37.7％，1965年达到了43.8％。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⑨这次调整，应该说对于高效率地培养专门人才、缓解工业建设人才缺乏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当时“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为工业化服务”的指导思想。但是，国家对高校的这一定位，以及与此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高校之外的中国科学院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消解了高校的科研功能，使高校成为单纯的教学机构而远离了科学研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高校在以后的发展中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长期脱离的局面。文革之前国家制定的两大科技发展战略，即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2年规划），以及1962年制定的“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即10年规划），都把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关的科学技术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但是以中国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等为主要对象，高校并没有被纳入当时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被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78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明确提出“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口号，从此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战略调整，使我国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重视。但是，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上，仍停留在一种较低的水平和层次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很低，科研与生产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脱节状态。基于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把科技与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技力量大步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面对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适时调整自己的办院方针，1987年，中科院适应当时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现状，提出“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的办院方针。⑩而此时的高校却没有适时地调整其定位，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把按计划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和目标，缺乏面向国家战略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动力，仍然徘徊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之外。

　　2、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高校服务社会的方向得以确立

　　1995年全国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随即被中央确认为国家发展战略。随着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成立，科技和教育被摆到了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我国高校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的中心。在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等的重点支持下，发挥人才和知识高地的优势，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五”期间，高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0%以上、重点项目50%左右；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30%以上；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1/3以上；组织或参与组织的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的1/4左右。

　　高校还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努力促进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了国家科技创新重要方面军的作用。特别是高水平大学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机构成部分，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中，在科技创新中承担重要责任，发挥重要作用。正在酝酿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把高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纳入其总体部署之中，这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是没有过的。这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校有着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支撑。这对于高校来说，无疑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为其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面向国家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搭建了一个宏大的表演舞台。

　　正是认识到高校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教育部科技委制定的未来10－20年高校科技实施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其重点就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人才竞争力发挥重大作用。985二期建设对高校重点支持的思路，就是要紧紧抓住国家正在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机遇，紧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重点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使之成为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动相应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使高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其导向实质上就是要求高校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引进一批重点大学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至此可以说，中国高校已经完全摆脱“苏式”教育的羁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发展和办学模式。

　　三、提高高校服务社会水平和效益的若干思考

　　高校服务社会领域非常宽广，空间非常广阔，本文想着重从科技创新、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角度谈三点想法：

　　一是突破原有的办学模式，自觉建立与产业的对接机制。

　　过去，高校的成果大都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满足于纸上谈兵，研发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定位不正确，教授们不屑于和不善于与市场打交道，实际上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企业为什么不看重大学，就是觉得大学太虚，就计算机到计算机，玩的是空手道。因此，高校一定要有意识地建立和企业对接的机制，要有对接的组织构架，不能光埋怨企业、埋怨市场，关键是自己的立足点要改变，要有实实在在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行动，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和企业建立起一种互信机制。实际上，不仅我国经济、产业的发展需要培育开发，需要吸纳和注入高技术，同样，我国高校的跨越式发展也必须通过思路创新，通过更好地服务和贡献社会来实现。象上海交大这样的学校，研究生有13,000人，再加上导师，如果只窝在学校的围墙里做论文，不要说对国家和城市发展做贡献，就是本身找论文题目就已经够麻烦的了。近几年，高校中出现不少老师著作和学生论文抄袭的现象，不能不说与这种封闭的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源头的活水一旦枯竭，隔年的沉渣就难免泛起。因此，大学教育要上水平，必须实现办学思想和理念的突破，注重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必须与社会和企业更好地结合。上海交大正在推行“雄鹰计划”，把一批研究生放到宝钢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企业出钱、出师资来同学校一起来培养人才，通过教育创新引导社会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以任务带学科，以合作育英才。当然，优秀的研究生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通过到企业一线，他们不但接触了实际，增长了知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以国家目标和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志向，坚定了报国之心和治学之志。经过培养，企业认为好的学生可以直接留下来为企业服务，这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很快就能在一些新的增长点上形成人力、智力集成，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学校培养的人才也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水平，一些毕业生就此直接进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领域，两全其美，校企双赢。这可能是高校服务社会和促进产学研联盟的一个突破。

　　二是打破科教分割的体制，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创新平台建设一直是高校的一个软肋，它要求针对高校长期存在的“小型、分散、自发、重复”现象，着重在创新教学科研体制上进行突破，把人才、基地和项目捆绑起来，有组织地进行科研。我们国家这么大，发展这么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巨大的需求，巨大的需求产生巨大的动力。高校要善于寻找战机，寻找攻坚的突破口。现在有些东西，人家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甚至早已形成了生产能力，你还在做；有些东西，人家急需，你又做不了，那么人家还要你干什么？在当代社会，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先分明的界限日趋模糊，科技竞争的焦点常常表现为自主的知识产权，因此，除了原创性的基础研究，高校必须做企业想做但做不了的东西，必须做国家和社会急需要你做的东西。比如，宝钢要从现在的世界第七向第六、第五迈进，国外就会封锁你，搞技术禁运，如果不搞科技创新，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形不成国家核心竞争力，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造船也一样，中国要成为第一造船大国，日本和美国都会封锁技术，这实际上就给高校带来了机会，关键是高校自己要有实力，要有攻坚的能力。而形成能力的重要抓手就是打破科教分割的体制，凝练重大创新目标，努力建设一批能持续产生重大科研成果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建立有利于相关科技集成创新的新型组织机制。为了建设一批能代表国家水平的研究基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进行国家实验室的试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调整、加强工作。高校作为科教兴国的重要方面军，要抓住机遇、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凝练目标，争取与自身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目标相适应的份额。

　　三是增强市场意识，更加重视技术转移工作。

　　我国正处在加速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阶段，特别需要战略高技术的主导和引领。但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很弱，技术推广的支撑环境还不完善，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日趋形成一体，人力和技术资源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流动，确立敏锐的市场意识，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紧迫。高校服务社会，既要扬己之长，又要避己之短，以推进建设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目标，加快技术转移和研究成果的转化，是高校有效服务国家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我认为，建立产学研联盟，从大学角度来看，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要根据不同学科、技术的发展特点，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对于一些高新技术，可采取直接孵化成企业的方式，通过市场需求导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对于一些综合性很强的技术，则立足于某一自主核心技术，采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实验室的形式与企业进行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和加速技术的扩散，使企业的低端产品不断向高端提升；在一些条件成熟的领域，也可以通过学科性公司的形式，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求，以国家目标把学校与企业凝聚起来，突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性约束，引发产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证教授们的个人利益，又要引导企业和教授把眼光放远，把教授个人的利益机制与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捆绑起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事业的发展前景激发人的创造潜力，不断提高技术层次，开拓市场前景，通过最终产品的实现来带动技术群的整体突破，从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

　　还应看到，世界市场已由过去的相对稳定逐步演变成现在动态多变的态势，过去的局部、地域限制性的竞争正在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格局。竞争孕育机遇，多变需要应对。但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外企业和中国企业还很难直接对话，高校在其中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校从2000年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一方面主动开展国际合作，组成高水平的国际产学研联盟一方面积极为企业牵线搭桥，开放式地吸纳国际技术资源。如我校与日本九州大学结成联盟，引入日本工业界的存量技术，通过二次开发，将其转移到长三角的制造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更使我们感受到了高校肩负的历史社会责任。

　　总之，借鉴国际成功的经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国高校应当坚定不移地扩张和强化服务社会的功能。在社会公认的高校三项职能中，这是长期以来的一条跛足。本文的探讨，既是一种呼吁，也是一种希冀。

--------------------------------------------------------------------------------

①（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29页

②（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③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④（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⑤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nual Report 2003, http://www.admin.cam.ac.uk/univ/annualreport/2003/n.html

⑥University of Oxford Annual Review 2002-2003, http://www.ox.ac.uk/, P24

⑦ http://www2.warwick.ac.uk/about/profile/finance/

⑧ http://www2.warwick.ac.uk/about/history/

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65页

⑩樊洪业：《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史事编年述要》，http://www.cas.ac.cn

（本文发表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http://gfb.sjtu.edu.cn/yjcg\_read.jsp?id=27&page=4

下面这个链接有不少相关的资料，你可以看一看。

http://gfb.sjtu.edu.cn/yjcg\_read.jsp?id=41&page=5